

#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

(连载上)

●徐庆全

周扬对来看望他的部下说：  
我身上患有两个癌症

1965年2月，江青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次上海之行，目的有二：一是与张春桥一起插手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改为《智取威虎山》)。江青此举，是通过这出京剧来吹捧当时在东北工作的林彪，以便同林彪勾结起来，借这座“尊神”攫取更大的权力。另一个目的，是物色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对于《海》剧，江青在1962年就提出要批判，但一直遭到陆定一、周扬主持的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后在北京找了一两个人去写，但也被拒绝。在上海，她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很快物色到了合适的人选，此人便是姚文元。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而且在文艺界一直以“左”的面目出现，早有“棍子”的绰号。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在中国当代史上，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人们莫名其妙地或漫不经心地看着徐徐拉开的帷幕，谁也不曾料到，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剧”，竟是一场把偌大中国搅得沸沸扬扬，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使神州大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创伤的政治动乱。

首先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

自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后，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新中国成

立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要领导人，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但是，毛泽东对周扬却并不满意，认为他“政治上不开展”。这个断语，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斗争中下不了手。毛泽东对周扬的这个断语，在很大意义上与江青有关。

1962年，一直在养病的江青，突然在文艺界“复出”任职了。复出后的职位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从职位上来说，江青还是周扬的部下。江青复出后所做的事情，她在“文革”中曾这样介绍：

►一九三九年，周扬(左)在延安与毛泽东、刘少奇在一起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毛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大体是这样做的。

但是，江青所起的作用，实质上影响了毛泽东对文艺界的决策，而不仅仅是个“流动哨兵”的角色。因为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评渐渐多了起来。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批示中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也许，在写下上述批示后，毛泽东仍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这样的话：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中，对中宣部领导下的文学艺术界的不满溢于言表，而负责这一工作的周扬，自然要赶快行动起来。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1964年元旦，在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周扬在会上就文艺问题作了汇报发言。3月初开始，周扬就布置中宣部领导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进行整风运动。

此后，毛泽东对周扬的不满，也逐渐显露出来了。这一年的5月份，毛泽东在谈到要把住在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时，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

“不了解阶级斗争”的周扬，还能领导文艺界

吗？但是，周扬此时还在努力地紧跟毛泽东的思路，领导着文艺界的整风。

到了1964年的6月，中宣部就一年来文艺界整风的情况，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实质上就是一份检讨。本来，这个报告还是个未定稿，但是，“流动哨兵”江青却急忙将这个草稿交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上面作了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就是毛泽东“文革”前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毛泽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的两个批示，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显然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在80年代谈到这两个批示时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近因”。那时，周扬当然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下来后，他所能采取的惟一做法，就是把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继续下去。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了。因为在文艺整风结束的1965年9月，由江青操纵的给整个文坛乃至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基本上定稿了。

在此前后，毛泽东把周扬找去，表面上态度和缓，实际上厉害。毛泽东相信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专横地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三个：夏衍、田汉、阳翰笙。毛泽东对他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建国后都被称为是“周扬的人”，现在要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批判，根子当然要挖到周扬这里。所以，“文化大革命”揭幕，周扬作为祭旗者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了。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见报后，立即引起了混乱。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这种打棍子的做法非常不满，在迫

不得已进行转载的时候，仍然想把这种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人民日报》进行转载时，在编者按中特意加上了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的话。同时，为了进行积极引导，作为五人小组成员的周扬，召集中宣部领导及专门负责学术批判工作的有关同志开会。周扬根据自己所能听到的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以及上海方面的动向，根据彭真的要求及自己对运动的理解，要求组织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用以指导斗争。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该报首次发表的表态性文章，这篇文章是周扬组织中宣部等几个单位的同志写成的。当年参与这篇文章起草的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中回忆说：

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写“退田”、“平冤狱”是呼应现实政治中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也不大以为然，认为过于附会。我们对于政治影射也拿不准，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正还是得往政治上联。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约略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所以方求文章还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从龚育之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文章的起草者还是文章的审定者，都对这样的批判文章的写作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方求”并无意与姚文元完全对立，而且是想把姚文元荒谬、蛮横的批判说得更周全一些。文章把《海》剧作为一种思潮——而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进



▲1949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主席台右起：郭沫若、茅盾、周扬。

行批判。作为一种思潮，文章把《海》剧高高举起，进行批判，显得很“左”，这使得许多读者感到对《海》剧的批判“又升级了”；但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文章却又把它轻轻放下，也就是不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使得深知其意的张春桥等怀恨在心。所以，这篇文章“后来被指责为周扬和中宣部对吴晗《海瑞罢官》搞‘假批判、真包庇’，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五人小组的扩大会议，强调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文化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等等。根据会议的精神，中宣部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称之为《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后，2月8日，彭真、陆定一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2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了下去。

但是，到了3月底，毛泽东的态度却有了转变。他在与康生等人的谈话中，指责《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对于中宣部，他说出了在“文革”中中宣部人人耳熟能详的那段话：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了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的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括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第一排左起:徐悲鸿、沈雁冰、周扬、丁玲(女)、田汉;第二排左起:马思聪、巴金、曹靖华、阳翰笙、胡风、蔡楚生;第三排左起:艾青、赵树理、郑振铎、柯仲平、史东山。

而此时,作为中宣部的“阎王”的周扬,因要做肺癌手术住进了医院。周扬动手术前,中宣部的龚育之和林润青一起到医院去看他。两人抱着“不烦扰他”的想法,“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但是,周扬心情不轻松。龚育之回忆说:

他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多少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这在现在,是很清楚的;在从前也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主席早有科学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法分辨清楚了。在文艺整风中,在批评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时候,“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周扬在青年

业余文艺创作会议的讲话中,还有一段话批评有些同志“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传统”。按照当时已经“左”得厉害了的斗争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周扬是不是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会成为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癌症呢?

周扬的预感是正确的。也就在他动手术的时候,2月2日到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率先从林彪的势力范围内向周扬开刀了。

这个座谈会纪要第一次提出了“文艺黑线”: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指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几篇文章——引者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座谈会纪要中有一大段讲30年代文艺,文中明显地不指名地点了周扬:

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的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熟悉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在3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前一个口号是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提出的,后一个口号则是鲁迅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文委书记冯雪峰商量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说到底还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把这两个口号的争论往路线斗争上扯,是老谋深算的康生。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文中说:

1966年3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告诉毛泽东:“鲁迅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的大众文学与党的国防文学是两条路线。”而当时领导“国防文学”那条线的“党”,是谁的“党”呢?康生言下之意,当然不是正在长征中的党,而是王明路线的那个“党”。这

样，同中央失去联系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周扬等代表人物便属于王明线上的人了。而毛泽东当时最敏感的恰恰是“路线斗争”，康生此招，可谓击中“要害”。这个问题虽然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当面同周扬谈开了、解决了，但时事变迁，他这时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民族浪潮淹没了阶级性，还说起鲁迅对夏衍的《赛金花》的批评。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布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至此，批判“文艺黑线”公开化。也是在这个月，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周扬手术后，来到天津休养。他读到了座谈会纪要，在给林默涵的电话中，对纪要中对30年代文艺的批评仍不以为然。他说：这个提法太简单了。

应该说，周扬此时却是“太简单”了，甚至有一点天真。等到他读到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批判他的文章时，他才会知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这个简单的提法，几乎要将他置于死地。

### 从“政治癌症”开刀，周扬成了 “文艺黑线”的“祖师爷”

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以“《红旗》杂志为纪念党的生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辑部为此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按语并发表文章，揭露批判周扬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电讯中说：

这期《红旗》发表了阮铭、阮若瑛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这篇文章揭露了周扬等人颠倒历史的阴谋。周扬等人公然同毛泽东同志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把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一个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打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旗号，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

文章指出，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首领。他极力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搞所谓“全民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这期《红旗》还发表了穆欣写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一文。这篇文章分析了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的错误本质。文章指出，这个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它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是彻底的阶级投降主义，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公开背叛。毛主席早就批评了周扬和他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路线。可是周扬及其一伙，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批评，阳奉阴违。他们心里不服，在表面上作了一些伪装，背着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

文章最后指出，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正是周扬。田汉和夏衍曾分别自封为三十年代戏剧界和电影界的“老头子”，他们在鼓吹“三十年代文艺”的问题上都是很卖力气的吹鼓手，但是站在他们背后挥舞指挥棒的却是周扬。代表修正主义的黑线，把它从三十年代贯穿到六十年代的，正是周扬。解放以来，我国文艺界的一切坏东西，几乎都来源于周扬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在文艺战线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周扬成了包庇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红伞”。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清除周扬这条修正主义黑线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也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针对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



▲毛泽东会见历史学家翦伯赞,右一为周扬(1963年11月)

二十四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曾参与《讲话》稿起草,并历来坚持宣传、贯彻这个讲话精神的周扬,现在竟然成为反对《讲话》的敌人。7月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全文转载了《红旗》发表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由此揭开了批判周扬的序幕。

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的情况。这就是为鲁迅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

在30年代,当革命的文艺界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尖锐争论的时候,同样是革命作家的徐懋庸,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对鲁迅提出的口号表示了不同意见。鲁迅为此写下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文中对两个口号的争论发表了意见,并对当时还十分年轻的革命者包括周扬在内也提出了批评。文章中所说的“四条汉子”,是指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时,在这篇文章中加写了一条注释。谈到这条注释,当年担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对笔者说:

这条注释,是冯雪峰同志主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时写的并经周扬审阅过的。加上这条注释,无非是说明该文章的写作背景等问题。“文化大革

命”中,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核对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周扬写的,但是经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他还让我加上了“的”、“稿”等两三个无关紧要的字。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还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当时,冯雪峰同志也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已经被打翻在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冒着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说明事实真相,这种高尚的品德使我深受感动,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周扬出狱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说到这条注释,顺便说说“四条汉子”。“文化大革命”中,“四条汉子”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四条汉子”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严重的摧残,田汉并被迫害致死。到底“四条汉子”犯了什么罪?当时谁也不清楚。可是,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四人帮”的敌对分子,是江青的敌人。

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曾给我讲过一件小事,足以证明当时对“四条汉子”的批判真是“家喻户晓”了:

1975年,周扬从监狱里出来后,有一次,他和夫人苏灵扬在中宣部留守组学习完后,乘地铁回万寿路。地铁里很拥挤,一位农村老大爷站立不住,苏灵扬张罗给他找座位。农村老大爷坐下了,可她身边的周扬“老大爷”,因年老体弱却倒下了。苏灵扬马上把周扬送到附近的301医院。挂号时,登记人问苏灵扬病人的名字。苏灵扬回答“周扬”。对方问怎么写,苏灵扬一着急就说“四条汉子”。登记人连忙说:知道了,并抱歉地笑了。

当年与冯雪峰交往甚笃的许觉民,在《冯雪峰的遗憾》一文中也证实了露菲的回忆:

“文革”期间,最初我们一起被拘留在文化部集训班,天天写交代和开批判会。那时《红旗》杂志发表了批判周扬的文章,其中涉及《鲁迅全集》

中关于“国防文学”的一条注释，对此作了批判并硬说这条注释是周扬写的，同时还将原稿的字迹制版一起登了出来。我们看了，一望知是冯雪峰的笔迹，注释是冯雪峰写的。我们在会上议论了起来。事后集训班的“领导”把我们叫去，说你们胡言乱语什么，这分明是周扬写的，你们说是冯雪峰写的，你们要开脱周扬？我们说这是雪峰的笔迹，“领导”把冯叫去，雪峰直认不讳是他写的，并说与周扬无关，是《红旗》弄错了。“领导”听后勃然大怒，说难道要我相信你不相信《红旗》？雪峰仍不动声色。他素来虽与周扬不和，但在事实面前并不因此嫁祸于周扬。尽管他一再受到“领导”的严厉申斥，他依然这么说。弄得那个“领导”十分被动。

尽管这条注释上一些改动不是周扬的笔迹，但是，在那个年代，既然周扬已经注定成为批判的对象，对于批判者来说，事实并不重要，重要是由批判这条注释开始，就可以把周扬归结到“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才能把批判深入下去。

7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出现通栏大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开火》，集中发表各地、各单位批判周扬的大字报。17日，《人民日报》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武继延的文章：《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这篇文章列出了周扬的八大罪状。

一、周扬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妄图抽掉无产阶级文艺的灵魂。

二、周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鼓吹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

三、周扬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周扬大量贩卖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五、周扬疯狂地鼓吹崇洋复古，顽固地抗拒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改造。

六、周扬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攻击文艺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

七、周扬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三名主义”、“三高政策”，阴谋对整个文艺队伍实行“和平



▲1962年，周扬在广州暨南大学与学生交谈

演变”。

八、周扬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妄图篡党夺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宣部举行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首先在“阎王殿”里开始揪“阎王”了。

在这次批斗会召开的时候，周扬仍在天津疗养。但当时的造反派并不知情，为准备这次批判会，他们到处寻找周扬。露菲对这一幕仍记忆犹新：

当时，造反派几次冲进大楼揪斗周扬，都因找不到而作罢。有一次造反派揪住体育卫生处的杜大公，要他把周扬交出来，杜大公被逼不过，大声高叫说：“周扬得了癌症快死了，他不在北京。”

周扬这时候还能在天津疗养，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照有关。露菲对笔者说：

当中央开始确定周扬为“文艺黑线”要加以批判的时候，刘少奇特意指示说，周扬有错误不要紧，有病养病，病好了作检查。当时红卫兵运动刚刚开始，上层斗争又是那么严峻，刘少奇主席这种充满了革命人道主义、又坚持党性原则的指示，使人感动。周扬听到刘少奇这一指示时，顿时泪流满面。就是这一高度党性原则的指示，后来竟成了刘少奇包庇周扬的“罪行”。刘少奇这位国家主席也被打倒，惨死在关押中。天理何在？

周扬不在北京也没有关系，中宣部造反派对周扬的批判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字报铺天盖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已经被

列入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而被打翻在地，这次周扬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作为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已经群龙无首了。为此，中央将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调到北京，担任中宣部部长，不久又升为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

周扬与陶铸的关系很好，陶对周扬也很关照。上任不久，陶铸就派中宣部的同志去天津看望周扬。

### 周扬被造反派从天津押解回北京

周扬夫妇住在天津市委的招待所。这里，芳草萋萋，树绿婆娑，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疗养的好场所。但是，此时的周扬，与其说是疗养，还不如说是在躲避那场惨无人道的揪斗。尽管招待所四周围起了高大的院墙，但是外面高音喇叭时常传来的“打倒走资派”和“打倒周扬”的口号，依然声声入耳。露菲对此回忆说：

当时周扬大病初愈，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恶性风暴毫无思想准备。他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的心灰冷了。他以为毛主席了解他，从1937年他到延安，直到60年代初，毛主席经常找他谈话，备加关怀。他想，无论如何毛主席不会相信他是反党的。他也从来没有反过党，更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我看到他的情绪极坏，便劝他好好保重，将来总有机会把事情弄清楚的，千万别走袁水拍的路。

“水拍怎么啦？”他惊疑地问。

“自杀过，没死，在抢救。”我告诉他副部长姚

▼1965年，周扬夫妇在天津与远千里等人在一起



漆上吊死了。听到这些意外的消息，周扬神情十分沮丧，连连摇头：“怎么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从这些话中，我感到了他的不安和痛苦。虽然他对中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甚至有些绝望，但当听到苏灵扬充满痛苦的叹息时，他仍然劝慰她说：“你不要难过，我就是有天大的错误，也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我对党没有二心，我忠心耿耿地为革命。”

话是这么说，但他的心里充满了痛苦的迷惘，他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他像一片没有依托的落叶随风飘荡，任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吹打。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啊！国家要出事啊。就没有人向毛主席说一声吗？”

听者无言以对。这“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毛主席发动的呀！

或许，这时周扬已经知道，绝大部分作家、艺术家都被揪斗了，所有有影响的作品，都成了“大毒草”。他也知道，这是江青在兴风作浪。

在谈到江青时，周扬同志说：“江青她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怎么能这样搞？打倒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文艺界的同志们是一直跟党走，是拥护毛主席的。”

也许是江青太了解文艺界了。为了树起她的“文化旗手”的形象，为了掩盖她过去的劣迹，更是为了夺取权力，她把一些了解她情况的老朋友送进监狱折磨致死，这样她就可以平安地登上王位。这就是现在的江青。周扬只了解过去的江青，对现在的江青，他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他自言自语地说：“江青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从周扬与江青的交往历史来看，他们确实应该是“老朋友”了。30年代，江青到上海后，周扬正在领导左翼文化界。江青到上海没有住处，就住在“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家里，那时与周扬就认识了。后来，周扬与江青都到了延安，关系也还不错。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周扬虽然因事没有到，但江青还是邀请过他。建国后，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供职，是周扬的下属。在工作中，这一对“老朋友”产生了矛盾。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谈到了一些细节：

江青为什么对周扬那样仇恨？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到底始于何时，他也不十分清楚。他只记得周扬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时候，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供职，两人在电影评价上相左。我带着这问题问过周扬，他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他说：“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我确曾和她有过几次冲撞。一次是关于她的党籍问题，她曾多次谈过她在左联时期是党员，但是我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后来又当文委书记，我一直没有她是党员的印象，因此不能加以肯定。据说后来康生证明了。我不知他的根据是什么。另一次是她在文化部下设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工作，总用左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电影。《武训传》不用说了，还准备批判《清宫秘史》等一些影片，她的批评不从艺术方面着眼，而多往政治路线上联。当她下去调查武训历史时候，这种表现很突出，钟惦棐也管电影方面的事，曾经向我多次说过。我也觉得总是很难办，曾经向中央反映了这种情况，我说江青喜欢发表意见，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她自己的。不久她便不再来文化部上班了，中央给她另外安排了工作。”

在各种有关江青的回忆文章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周扬所谈的事，当然要成为江青报复的由头。

建国后，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而江青就在中宣部任电影处处长。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第一夫人”在手下工作，就会经常出现到底谁领导谁的问题，如此时日既久，彼此产生摩擦造成矛盾在所难免。江青不仅不会服从周扬的领导，而且还一直觊觎着文艺界领导人也就是周扬的那把交椅。而周扬本人又看不惯江青，往往坚持原则以抵制她的瞎指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摩擦，江青当然会对周扬怀恨在心。

在建国后发生的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周扬和江青之间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冲突。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江青出尽了风头也尝到了甜头：她率领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威风凛凛地开赴山东，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20多天的调

查后，《人民日报》便连续发表了该“调查团”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岂料就在江青正要将这场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的时候，周扬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在为这场运动作出总结的同时也画上了一个句号。前线的大将正将战鼓敲得震天响，后方的元帅却敲起了收兵的铜锣，这自然让还没有出够风头的江青大为恼怒，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毛泽东对周扬乃至文化界的不满。在对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方面，也许江青比不上周扬，但在其他某些方面，江青却比周扬更了解毛泽东。她知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匆匆结束以后，毛泽东一直在思想文化界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所以，1954年，江青便不失时机地抓住一篇极普通的与俞平伯商榷的文章，采取了积极行动。

这是江青与周扬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激烈的冲突，导致这一冲突的直接导火索，便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究竟应该在《人民日报》还是在《文艺报》转载的问题。也正因为周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惹怒了江青，所以才直接引发了那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

▼“文革”中批判周扬的漫画





▲周扬的秘书露菲

一文。邓拓在没有同周扬商量的情况下,便派人找到了李希凡和蓝翎,在征得他们同意之后,又让他们尽快将文章略作修改,然后发表。岂料文章的小样排出之后,周扬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周扬干涉此事并非超越权限多管闲事,而是出于一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当时人民日报社的文艺组是由报社总编室和中宣部文艺处双重领导的,而且尤以后者为主。文艺组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要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再由分管文艺处与科学处的副部长周扬亲自审定。因此,在报社集中力量大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势下,出于对报纸版面的考虑,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周扬不同意在《人民日报》转载一篇“并不成熟”的学术文章。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明明知道《人民日报》的文艺组主要由中宣部文艺处领导,却不找分管文艺处的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反而直接跑到人民日报社去找邓拓,显然是她痛恨周扬并试图避开周扬以达到预期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不正常的行动。当她好不容易捕捉到一个机会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周扬的阻挠,这不能不让她感到恼火。《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一事因受到周扬的阻挠而搁浅以后,原来试图避开周扬的江青就不得不面对面地与周扬进行交涉了。然而,在她于9月下旬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之后,却发现周扬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周不但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而且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这其中既有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也有人民日报社的正、副总编邓拓、林淡秋等人。直到此时,他们仍然“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他们当然“只要按组织

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周扬态度的坚决,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对江青经常“拉大旗作虎皮”的反感,也透露了他对江青超越职权在文艺宣传部门指手画脚瞎指挥的抵制态度。由此亦可看出,周扬在平时处理自己与江青的工作关系时,并没有将她当做“第一夫人”特殊看待,更没有利用江青的这种特殊身份作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在周扬身上,还有中国传统文人良好品质的闪光的一面。

在这次特殊的交涉会上,周扬没必要说出自己之所以阻止江青的深层原因。因为仅堂堂正正的理由就已相当充分:“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很粗糙,态度也不好”,等等,这是针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评价;“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这是说的实际情况;“还是作为学术问题为好”,则更证明周扬等人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江青有借此开展一场批判运动的意图。江青与周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在冲突过程中周扬暂时占了上风,其结果是导致了江青对周扬的更大怨恨。“我恨死周扬了!”江青在公开场合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可见她对周扬是何等的痛恨。她要彻底地整垮周扬这位“文艺黑线的祖师爷”,以便自己成为“文艺界的旗手”或登上“文艺女皇”的宝座。12年后,当周扬被批倒批臭且被关进秦城监狱之时,他与江青的这次冲突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大罪状。197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北京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纪念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仍然抓住周扬当年反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一事大加特批,可见江青在与周扬的这次冲突中对他结下了多么大的仇怨!只不过在此时的批判文章中,却又在周扬面前拉上了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更大的“大人物”——刘少奇。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周扬对这一切看得还不是那么真切,所以才会对着来人发出“江青也是老朋友”的疑惑。

.....

目送着来看望他的老部下离开这里,周扬与

夫人苏灵扬又回到沉寂的房间。招待所外的高音喇叭又传来了“打倒周扬”的呼喊声。周扬和苏灵扬相对无言。他们知道，在这里躲避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首先遭殃的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由于周扬的关系，也由于苏灵扬曾是一所高等艺术学院领导的关系，在中宣部开展对周扬声势浩大的批判的同时，中国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提出要揪斗苏灵扬。当时，陶铸刚刚担任中宣部部长，对造反派的要求阻拦不住，只好派人告诉苏灵扬，要她经受考验。当时，为了对周扬在天津的住所保密，经联系，天津方面把苏灵扬送到天津郊外。中宣部特意安排周扬的秘书露菲和孟伟哉去接。露菲对笔者回忆说：

我和孟伟哉同志到天津来接。同车去的还有中国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我只记得红卫兵中的一个，是短头发，穿着一身旧军装，晕车。苏校长上了回北京的车，经过中宣部大门，他们让我下车，车子直接开到了中国音乐学院。这一天对苏校长来说是个最黑暗的日子。据孟伟哉同志回来告诉我，真是惨不忍睹。他说：太可怕了，你要看到那情形，准得发心脏病。他描绘的那情形，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后来苏校长告诉我，动武批斗她的主要问题是问周扬在哪里？苏校长在那里度过了三天三夜可怕的时光，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变了形。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再这样折腾下去，性命难保。中宣部的领导以本部要揪斗她为由，将她要回来了。

能将苏灵扬要回来，还是陶铸特意安排的。在陶的安排下，由中宣部“文革小组”的阮铭负责执行。当时，造反派让苏灵扬跪在卡车上，高举着黑牌子，一路上喊着：“我是周扬的黑老婆！”到了中宣部的沙滩大院，阮铭讲了一通话，把造反派打发走了。

此后，露菲陪伴苏灵扬住了几天，部长陶铸和



▲周扬的女儿周密

其他领导决定把苏灵扬送回天津去，继续陪周扬同志养病。露菲说：

这个任务交给了文艺处的孙艳华和我。当夜到了天津，天津市委请了医生检查苏校长的伤情，当他们看到她脖子被挂石头的铁丝勒出的深深血印时，都惊呆了。苏校长不让周扬同志看到自己的伤痕，怕他受刺激。那时，周密的女儿阳阳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晚上，苏校长不能走路，爬到我和小孙的房间，让我们告诉管事的人，不要让阳阳看到她这个样子，怕把四岁的小外孙女吓着。过了一些日子，伤好了一些，才和周扬生活在一起。

可是，这样的安静日子没过多久，到1966年的12月1日，周扬和苏灵扬同志就被从天津揪了回来。

11月，“中央”要在天津养病的周扬回京接受批斗。这里所说的“中央”，就是江青、张春桥、陈伯达他们。中宣部接受了任务后，对如何把周扬揪回北京而不出差错，还真费了一番心思，并草拟了“作战方案”：决定派两位与周扬夫妇熟悉的人同去天津。当时，已经“靠边站”并在大小会上一直被点名批判与周扬夫妇划不清界线的秘书露菲，被造反派们选中，去执行押解周扬回京的任务。

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心里充满了矛盾。我去天津起着一块“招牌”和“诱饵”的作用：看，你的老秘书都来了，你就放心回北京吧！但我明白，这次他们回北京是凶多吉少，他们面临着严酷的考验。

车到天津周扬的住处，天已黑了。露菲回忆说：

上得楼来，迎面站着周扬同志，他穿着中式的灰色上衣，背着手站在那里。他腰板挺直，目光冷静，神态坦然。我们突然出现，他没有吃惊。即使看到其中有不认识的人，他也没露出惊疑的神色。他像往常一样，微微点点头，算是招呼过了。那个时候，他是“黑帮头目”，他既不能称我们为同志，我们也不能叫他部长。当他那冷静而坦荡的目光移向我时，我只得把头掉开，其他的熟人也是如此。



▲周扬与苏灵扬

行的。停了一会儿，勉强从他嘴里挤出了一句话：“中央要你回北京。”他说话的声音有些不自然。

周扬点点头，仍然没有说话。

苏灵扬问了一句：“现在就走吗？”

“马上走。”老刘的声音仍然是不自然地颤抖着。

苏灵扬把两只不大的箱子提出来，马上有人把它放进汽车的后备厢。看来，周扬夫妇是早有准备。十几年后，苏灵扬告诉我说：“那天，天津方面传达了北京的指示，说要我们回去，我就明白了。我把我们俩的东西分别装了两个箱子。这样做，不至于到走的时候找东西花费时间。我在周扬的箱子里，除了放进日用衣物之外，还给他装了一包饼干和一点白糖。他的肺刚动过大手术，体力差，需要营养。我让炊事员小李给他煮了几个鸡蛋，周扬不要。他说如果带了鸡蛋，造反派知道了会给小李罗织罪名，说他同情黑帮。不能连累他。”

苏灵扬的叙述，使我十分感动。就在那种险恶的情况下，周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周围的人。

周扬夫妇上了车，离开“古堡”驶向北京。

在北京，周扬的家已被查封。从天津回来，他们已无家可归。作为周扬的朋友的陶铸，这时候虽然已经无法再保护周扬了，但是，他还是尽自己所

一位新近调到中宣部的老刘，因曾经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成为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此刻他站在周扬面前有些手足无措，说不出一句话，但是毕竟“重任”落在他肩上，他不说话是不

能，希望为周扬安排一个住处。在安排人到天津接周扬的同时，陶铸就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说：

在电话中，陶铸说，周扬过两天从天津回来，住在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安排个住的地方。但是，汪东兴却在电话里用质问的口气问道：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说：周扬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安静的住处，王明住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汪东兴冷冰冰地说：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

陶铸的电话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接周扬的汽车驶进北京后就直奔位于沙滩的中宣部的办公楼后院。押解人员将周扬夫妇带进办公楼东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后，马上就有中宣部的一个造反派把他们看管起来。周扬坐在东面，苏灵扬坐在西面，他们中间不但隔着几张办公桌，还有一个横眉竖目的造反派夹在他俩中间。

周扬夫妇没有说话，默默地坐着。周扬用右手托着腮，十分疲倦的样子。苏灵扬沉静地坐在拐角处的一把椅子上，她平视着前面，什么也没有说。那个造反派的脸上挂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可厌表情。

过了一会儿，有人通知要周扬一个人走。到哪里去，他没有问，苏灵扬也没有问。周扬站起来向苏灵扬看着，他们俩互相看着，周扬流泪了，那泉涌般的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了出来，苏灵扬没说什么，也没流泪，她平静得出奇。

事过若干年后，苏灵扬回忆这段情形时说：“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不能不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不忍心在他面临巨大考验的时候，再给他加重个人情感方面的负担。他已经够受的了。”

苏灵扬目送周扬走了。这对朝夕相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夫妻，默默无言地分别了。

中宣部把周扬送到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师部驻地。车子一到，已经有几个军人等在那里。周扬下车后，就被停在那里的吉普车载走了。

（未完待续）